

“双减”落地超半年 教育生态如何重构

有人这样评价已落地7个多月的“双减”政策:终结了愈演愈烈的校外补课竞赛。

“双减”政策的实施最高效地遏止了校外培训在资本作用下的疯狂扩张以及培训焦虑的蔓延。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原来的12.4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压减到9728个,压减率为92.14%;原来的263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也压缩到34个,压减率为87.07%。

中央“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要“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当“双减”的阶段性目标完成后,重构良好教育生态将成为“双减”落实工作的重中之重了。

学校教育将如何“提质增效”、家长的焦虑能否真正缓解、良好的教育生态如何构建等深层次的问题成了社会,也是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双减”落实好不好关键还要看课表 学校管理要重构

学生回归校园后,对学校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当然是学校的教育质量。“家长不放心、学生愿意不愿意,要看学校能不能让学生在校园内就学学学好。”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罗滨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要满足学生和家的需求,学校必须从国家课程、课后服务、课堂学习和课下作业等多角度整体考虑学校教育的供给结构、内容结构。而其中第一个要提升的就是学校的教学管理。”

学校教学管理涉及学校教育管理的方方面面,看似宏观,其实也很具体,比如教学计划最终会具体为一张张小小的课表。

很多一线校长也有类似的想法。

“‘双减’落实的好不好关键还要看课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知名小学的校长说,以前学校的课表不包括下午“三点半”之后的内容,而“双减”之后就重新规划。

“其实课后服务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单纯地增加一个看管的时间段,而是整个校内教育供给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因此必须要提高课后服务的适切性和针对性,一定要跟下午3点之前的教育教学内容进行有机衔接和整体设计。

这对所有学校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北京市某中学一名年级组长说:“以前排课表是一件挺简单的事,复制粘贴,再把个别有变动的老师调整一下就可以了,现在不行了,不仅要兼顾‘三点半’之前,还要兼顾‘三点半’之后,不仅要考虑老师是教什么课程的,还要考虑每个老师还有什么其他特长,同时要兼顾每个老师的工作量……”

“而且‘三点半’之后的课程不一定只开设在一个年级内,还可能是几个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是混龄教育。”罗滨说。

当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不仅要穿越班级、年级的界限,甚至是穿越学科的界限时,学校必须对教育教学进行重新规划,打破多年来形成的惯性思维,对学校管理、教学管理进行重构。

作业不能再是“最熟悉的陌生朋友”

学校教研要重构

作业,是每一名中小学教师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件事。

不过,在罗滨看来,这些年来作业却成了教师们“最熟悉的陌生朋友”。“老师们每天讲课的内容都有课件,但是‘作业’那一栏里通常是简单的‘P15-P18’,有的干脆在教学设计里直接写上‘作业略’。”罗滨说。

在“双减”政策的顶层设计下,作业不再是简单的重复演算、抄抄写写,甚至题海战术,而是学校教研的一部分。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学校校长刘希娅不久前在全国两会“代表通道”上所说的那样,“给孩子们提供的每一道题、每一份教学设计都经过精心论证,让专业而扎实的校本教研,成为减负与提质之间的重要杠杆。”

目前,这个“杠杆”依然是薄弱

环节。有些地方和学校还出现了研究性作业“走过场”的现象。

近些年,中高考改革让越来越多的学校意识到了对学生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也尝试着设计出了一些研究性作业,但是很多教师还只停留在“作业布置下去就完了”的思维中,没有通过作业分析学情的意识,久而久之,学生对这类作业也就不重视了,甚至有些作业成了家长的负担。

“现在,实践性、长周期的作业少的状况普遍存在”,罗滨说,“好不容易有了长周期的作业,结果一些老师的批改和反馈不够,对作业结果的使用也不当。”

这反映出当前学校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错位:不少学校在课堂教学环节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和探索,从以教师的“教”为主转变为学

的“学”为主,但是在作业环节,“教师仍然习惯于应试导向下的反复练习。”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说。

老师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不久前刚刚完成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近五成教师存在着作业设计方面的困惑与困难,比如,“作业素材与相关资源不够”和“设计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的能力不强”等。

参与该项调查的专家表示,要提升教师作业设计能力,除了将作业设计纳入地方教研体系和教师教研规划外,还要对教师开展作业设计的专项培训,并利用各级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汇聚共享优质作业资源,提高教师分层、个性作业设计与评价能力。

孩子的成长不是“KPI”

家长的观念也要重构

学校正在行动,部分家长却还在摇摆。

刘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双减”一代家长,“双减”政策出台后,她的女儿正好上小学一年级。

没有家庭作业、没有一次次的考试,考试后也没有排名……

看着女儿的学生生涯在快乐中开启了,经过应试教育“洗礼”的刘娜多少有些不习惯。不过,真让刘娜感到“扎心”的是一次“随堂练”。

一共30道题的“练习”,孩子错了14道。“我感觉自己就像‘拆盲盒’,真不知道她哪天会拿回来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刘娜说。

刘娜不准备就这么等下去了,她要给女儿找老师了。“我们的日常工作,领导给布置了任务,你就知道了自己的KPI(企业一种目标式量化管理指标——记者注),有了KPI咱们就可以照着目标努力

了。”刘娜说,“现在没有作业、没有考试、没有分数,我难道必须等到中高考再着急吗?”

伴随着家长的焦虑,一些隐形变异的培训班正在暗中生长着。

前不久,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在确实出现了学科类校外培训由“地上”转入“地下”的情况,这类培训以“高端家政”“众筹私教”“游学研学”等隐形变异的形式存在于楼宇中、居民区里。

其实,家长们也想改变。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科技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胡卫认为,现在家长们评价孩子时的坐标系是建立在“邻里间”的,常说的一句话是:“看看×××家的孩子”,邻居家的孩子如果补了三门课,自己家孩子也得去补三门。

“现在要建立一个长期的、纵向的评价系统,不再跟别人比,而是

跟自己比,看看孩子这一次跟上一次比有没有成长,这叫作个人内差异评价。”胡卫说,家长只有建构了这样的参照系,才能把目光真正聚焦到孩子的成长上,只有这样,一直以来所强调的“家长要陪伴孩子”才能实现,否则,家长一定是盯着别人家孩子的长处和自己家孩子的短处的。

“双减”是始于教育但不止于教育的一场观念变革,教育生态的重构依托的不仅是改变学校、教师、家长、学生等教育要素的观念,更要改变全社会的成功成才观念。正如胡卫所说:“孩子的成才不能只有一条路,只有全社会的各种门路都打开,让学生能够在各条道路当中都能才。”

“双减”对教育生态的重构依然在路上。

(据新华网)